

# 20 世紀晚期以降的中國論述： 國關與歷史的對話\*

李宥霆\*\*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來，中國崛起勢不可當，各式各樣的中國論述也在學界發酵。這些中國論述採取的觀點不一，對華態度也大相徑庭，然其關注的重點大致有二：一是現代中國的政經能量，二是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化。兩相結合，滋生了形形色色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發展前景的預測。雖然相關論述汗牛充棟，但在上述的政經現實與歷史文化兩者之間，往往有所偏倚，相互的對話和理解似還有待加強。有鑑於此，本文擬從知識探究的角度出發，檢視 20 世紀晚期以來兩種不同傾向的中國論述，比較其目標和方法的差異，並思考溝通對話的可能性。

關鍵字：中國論述、國際關係、歷史、文化、國族認同

---

\* 本文寫作得到國立臺灣大學支持（「二戰以降的中國形象：跨領域的討論嘗試」研究計畫，108 L7203）。初稿曾以〈二戰以降的中國論述：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檢討〉為題，發表於臺灣政治學會 2019 年會（2019 年 12 月 8 日於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幸得評論人指正；部分內容亦曾報告於中國再起 III：與鄰邊互動的歷史與現實研討會（2019 年 12 月 16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並從交流中深獲啟發。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亦豐富了筆者的思維，使得論文內容更加完整。此外，本文既屬跨領域之作，實有賴於學友的相互切磋，方得順利完成。在此謹誌數語，向上述先進和機關表達最深的感謝。

\*\* E-mail: ytandylee@ntu.edu.tw

投稿日期：109 年 7 月 14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0 月 14 日

## 壹、緒論：「歷史」作為理解中國之鑰

自 20 世紀晚期迄今，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各式各樣的中國論述（China discourse）也蓬勃展開。這些論述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往往大異其趣，然其目標，卻總不外乎勾勒出一個清晰的中國形象以供世人理解，甚至應對。總括來說，相關論述呈現出兩大焦點，一是現代中國的政經潛能，二是傳統中國的文化內涵。兩相結合，滋生了許多關於中國前景，及其對未來世界影響之預測。若深一層看，我們可以發現，許多言論在不同程度上都提供了某種版本的歷史詮釋，以說明傳統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實踐，如何形塑當代中國的行為模式，並將對既有的世界秩序帶來何種挑戰或啓示。換言之，前述的兩大焦點，基本上都相當突出中國的「歷史性」（historicity）。不過，由於專業背景差異，各家所論往往或偏於現代，或偏於傳統。更精確地來說，偏重現代的論者多著眼於國際關係，而以根深蒂固的「中國模式」作為衝擊既有格局的變數；偏重傳統的論者則深入歷史的複雜性，對於「中國」的定義與內涵反覆探勘，而面對「中國崛起」，也會進行多角度的商榷。有鑑於此，本文將採取跨領域的視野，嘗試接通國際關係和歷史文化兩大脈絡，探究 20 世紀晚期迄今圍繞著中國形象所展開的議論。寫作目的可略分為如下三層：第一，在國際秩序似乎面臨重大轉變的今日，考察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強權，在學者眼中主要以何種姿態呈現。第二，探討各種論述如何詮釋中國歷史的獨特性，並以之作為立論根據。第三，以中國為主題，比較國關和歷史研究的取徑差異，並試圖找出對話的空間。

顯而易見，「跨領域對話」可謂本文的精神所在，而此種對話之必要，實導源於現行學術領域之間的隔閡。眾所周知，現代社會科學（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之得以發展，其前提自然是所謂現代社會的形成。但誠如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所言，「現代社會形成（modern social formations）的一大特徵是，其分化出了幾個性格獨特且界線分明的活動場域，……可以分別名之為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文化領域。」（Hall, 1992: 7）當然，社會場域（以及相應的學科）之間要如何劃分，不免隨時而異，

但支持著其分化傾向的，則是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所揭櫫的西方一貫的思維模式：強調理性（rationality）之有效、恆久、普遍性。<sup>1</sup> 由此形成了每個領域的專業化、實證性，以及相當程度的排他性。當然，作為現代學術制度的建立者，西方學界對此現象已然有所警惕。<sup>2</sup> 不過，如果站在西方之外來看待現有的學術體系，反思或許能更加徹底，如同汪暉（2008: 1）所說，在研究中國歷史時，人們往往會產生疑慮：「首先是對理論範疇和社會科學範式能否有效地描述和解釋歷史現象的疑慮……；其次是對西方概念和範疇在解釋中國現象時的有效性的疑慮。」上述第一種疑慮在西方內部也會發生，第二種疑慮則更牽涉到西方知識霸權的問題。而本文主旨，正是以隨著中國崛起而展開的中國論述為例，觀察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和中國歷史複雜性之間的拉鋸。<sup>3</sup>

理解中國，為何須由歷史入手？下面的言論頗值得我們參考：

歷史是理解東亞的最佳途徑，理由如下。首先，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東亞人民更習於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自己。……再者，東亞獨特的美學、思想、制度成就，最好是循其演進的軌跡來加以研究。這些成就，應該與變化快速的當代東亞文化分別對待。……東亞現今的騷動，乃是新力量（當中許多源自西方）與舊傳統交錯所形成的結果。（Fairbank et al., 1989: 2-3）

這段話出自於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賴世和（Edwin O.

1 柏林將這種西方思維模式歸納為如下三點：一、一個真正的問題，只會有一個正確解答；二、尋找解答的方法，不分領域，其本質上必須是理性的；三、以此獲得的解答，放諸四海皆準，不因任何條件而有差異（Berlin, 2001: 80-81）。這種習慣可以上溯至柏拉圖，在近代則因科學革命、啟蒙運動而盛極一時。

2 例如，由 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所主導的「重構社會科學」委員會，就是在反省現代社會科學的運作方式並思欲重建。可參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1996）。

3 在 1964 年，《亞洲研究學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便曾以“Symposium on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為題，集結數篇探討中國研究和社會科學之間關係的文章（Skinner et al., 1964）。不過，彼時討論的重點在於漢學（Sinology）之學科屬性，今日人們更感興趣的或許是中國能否改寫西方所建立的學術典範。今昔對照，頗饒趣味。

Reischauer, 1910-1990) 等學者所合撰的《東亞：傳統與變革》(*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由於作者們都同意古典中國文化在東亞地區的根源性、籠罩性影響，並認為傳統東亞實可稱之為「中國文化圈」(the Chinese culture area; Fairbank et al., 1989: 1)，故引文裡的「東亞」若以「中國」代換，似乎更加貼切。

從現實面來說，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由於地理相對隔絕，故能在時間的長流中，發展出自成一格的文化，儘管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未曾受到外來影響，但從物質、精神到制度方面，中國文化均有其獨特鮮明的性格，此乃不爭的事實。從認知面來說，由於史學在中國發達甚早，且修撰正史的慣例綿延不絕，故深厚的「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也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sup>4</sup> 限於篇幅，此處無法詳論中國人歷史意識的內涵，但若扣緊本文主旨，我們可以指出，即使是在談及國際政治的場合，中國人也習慣於從歷史的角度進行思考，此一現象已受到越來越多關注，許多觀察家還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觀與該歷史意識密不可分。下面的描述便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

他以提醒賓客「中國是有五千多年歷史的古老文明」做開場白。這句話，從某方面來說，是照本宣科的官話；但中國對其數千年歷史的認知，正是其自我理解的根本。(拉赫曼著，洪世民譯，2017: 22)

這是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於《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Easternis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Asian Century*)一書中，描述他在2013年與一群西方訪客獲習近平接見時的場景。此語生動地展示了「歷史」之為物，其固有價值和外交運用兩者間的融合交錯。一方面，悠久的歷史被打造成為中國特殊的文化品牌，由此贏得外人尊敬，或至少是矚目；另

---

4 關於以中國為範型的東亞史學傳統，以及歷史在該文化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可參見 M. Sato (2001)。

一方面，過去數千年來反覆發生的朝代興衰，治亂分合，也確實形塑了一套循環史觀，這與啓蒙時代以降的西方，傾向於將歷史視為一直線進步的過程（並由西方本身體現發展的高峰），其間有顯著的差異。<sup>5</sup>

究其實際，「從中國歷史展望中國甚至世界的未來」，現已成爲一套時髦言論，具有相當的學術和輿論市場。舉例來說，一篇發表於2012年的論文〈中國喉舌：中國例外論和歷史的政治〉（“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便指出，「對於歷史的使用和濫用不只是一個學術議題，也透露了中國和西方的菁英們將如何形塑未來世界。」（Callahan, 2012: 35）該論文的結構甚具巧思，作者挑選了六本從中國歷史出發以預測其未來地位的著作進行分析，然後將之歸納爲兩個大類：其中一類是所謂的「中國喉舌」（Sino-speak），其毫無保留地讚美中國文明的優越性，並預言中國中心式的天下體系、朝貢制度將浴火重生，主導未來的國際關係；另一類則持批判態度，從概念和歷史細節去質疑「中國喉舌」所過度美化、吹捧的中國文明。就學術立場而言，此文作者顯然對於「中國喉舌」一類的話語存有戒心。

誠然，本文的關懷與上述論文有相似之處。不過往後行文之際，筆者不會傾向於任何立場，而純粹是從知識的觀點，討論國際關係論述裡的中國歷史，與史學工作者筆下的中國歷史，其依違程度如何，並且進一步反思關於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以及歷史詮釋在現實場域的適用性等問題。爲達此目標，本文第二節將首先聚焦於國際關係脈絡裡關於中國地位的辯論，其中歷史和文化考量佔了醒目的位置，但隨著論者立場不同，有人將其視爲資產，有人則視之爲包袱；若從知識的角度來看，則國關學者筆下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往往被當作一個具有同質性的整體來對待。第三節則切換語境，探討人文學者對中國的民族、國家、文化等問題所提出的後設性質疑，由此深入「中國」概念所包含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及其對於建構一個中國式的國際關係理論，所可能提出的挑戰。第四節則在前文的基礎之上，重點選取國關學者王飛凌和歷史學者葛兆光的著作加以比較，這兩位學者於近作之中，都以整體式、鳥瞰式的觀點來把握中國歷史的特徵，然所得結論呈現出有趣的反

---

5 關於 18 世紀以降西方歷史思維和史學研究的介紹，可參見 G. G. Iggers (2001)。

差，將兩者並觀，一來可凸顯兩個領域的取向差異，二來也可從中尋找接榫的契機。結語部分則是總攝全文重點，並提出關於跨領域對話的幾點想法。

在進入正題之前，筆者擬對本文的命名、取材、分節的標準稍作說明。有鑑於中國崛起帶給全世界多方面的衝擊，也激起學界進一步認識中國的欲望，因此本文探討 20 世紀晚期以降出自於國關和歷史領域的中國論述，分別從國家的外延和內涵兩個角度去理解中國的形象。不過相關著作汗牛充棟，難以面面俱到，故筆者盡可能地專注在國關和歷史之間的跨領域對話，以凸顯雙方取向之差異，及對於未來研究的啓示，至於各領域內部的分歧，則力求言簡意賅，務使本文在層次的豐富性和條理的明晰性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基於此，文內所引述者不拘於學派和立場，主要著眼於其對「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有何洞見，此所以在國關方面，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李光耀（1923-2015）、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朱雲漢等人的言論均多所採用，而在歷史方面，費孝通（1910-2005）、許倬雲、王明珂、葛兆光等分屬於不同人文領域的專家也都成為分析對象。這樣做的好處是，當我們稍稍跨越學科內與學科間的壁壘，從大處著眼，對不同領域比較互勘，所看到的景象是，爲了理解並預測中國的發展，國關和歷史兩種知識必須相互支援，然受限於各自的問題意識、思維習慣、研究方法等，雙方恐怕也非一時之間便能合作愉快。不過，國關與歷史既交互爲用，便沒有強行拆分的可能，以下各節雖然或偏重國關，或偏重歷史，但兩者的關懷多有互通之處，故筆者的分類只求其大概，不能涇渭分明；話說回來，一旦關懷有所偏重，研究傾向便可能大不相同，因此本文也會嘗試釐清，「在國關場域運用歷史」和「從歷史角度看待國關」兩者之間，具有什麼樣的緊張關係。

## 貳、國關語境裡對中國文化的評估

儘管在 20 與 21 世紀之交，中國能否算得上是「強權」仍不無爭議，但時至今日，無論評價如何，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重要地位，已然有目共睹。<sup>6</sup>

6 Gerald Segal (1953-1999) 曾經在“Does China Matter?”一文中力駁中國的「強權」形象。

隨著中國的實力節節上升，其於國際場合的行為模式也成了熱門的研究課題。誠如吳玉山（2018: 5-6）在〈歷史與國關〉中所言：「在此最關鍵的問題是：『究竟中國的對外行為有多少是受到其獨特文化的影響？』對國際關係學者而言，一般的傾向是認為存在著普遍適用的理論，可以跨越時空，對不同國家的對外行為提供解釋，這與文化特殊論的看法自然不同。由此我們發現有兩種歧異的觀點：文化途徑與普適主義。」但他隨後便指出，問題的複雜性遠不止於此，解釋中國對外行為的理論，雖然分化出「文化途徑」與「普適主義」兩大方向，但兩者內部都缺乏眾所公認的典範。質言之，所謂的普適主義，其實是從西方經驗所歸結出來的理論，即便如此，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主要流派也還在持續爭鋒，未能定於一尊。<sup>7</sup>至於文化途徑，則旨在尋求符合中國特殊歷史經驗的解釋框架，不過其解釋效度，仍須面對重重的質疑和檢證，吳玉山（2018: 12-18）便提供了幾個值得反思的方向。為免過度發散，本文將不會縷述普適主義與文化途徑兩者各自的發展，因為如前所述，筆者目的不在於援引主流理論並證明其效力，進而支持或反對特定立場，而是將目光集中於緒論裡所反覆強調的「歷史詮釋」，故本節擬重點考察在面對中國崛起之時，各個國際關係論者如何運用「歷史」和「文化」以證成其說，而這在研究方法上，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問題。

---

該文於 1999 年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後收錄於 Barry Buzan and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Segal, 2004: 11-20) 與之針鋒相對，Michael Szonyi (2018: 1) 在一本中國問題論文集的導論中，開宗明義說道：「如果你拿起這本書，你可能已經接受了中國事關重要，而理解中國也事關重要這樣的前提。就某種顯然的意義來說，中國向來事關重要，而將來也會如此。」

7 關於西方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簡單介紹，可參見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大衛·威爾許（David Welch）（2019）合著，張小明譯：《哈佛最熱門的國際關係課》（臺北：商業週刊），頁 15-22。概略言之，現實主義向來居於主導地位，其擁護者認為國際政治在本質上是權力和安全的問題。另一強勁的傳統是自由主義，倡議者以為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全球社會，因有各種交流存於其間，故對國家的行為會產生制約。至於建構主義，則試圖解釋世界政治中的長期性變革，其跳脫單純的利益和制度考量，而強調觀念、文化、道德、認同等因素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這三種理論各有千秋，能夠相互糾正和補充，但都無法完全取代對手，此外也還有其他非主流觀點，於茲不贅。雖然國關領域內部的派別之爭非本文重點，但透過上述介紹，也能約略推想，各家理論之中當以建構主義最有可能與「中國文化特殊論」對話。下文論及季辛吉時另有分疏。

無論就政治或學術層面而言，深諳國際事務，並且以對中關係作為其生平主要事業的，或許當首推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因此本節就以之為線索展開討論。身為開啓冷戰時期美中新關係的先驅，季辛吉對於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一直都有很高的估計。在 1994 年出版的《大外交》(*Diplomacy*) 一書中，他便已言之鑿鑿：儘管經過百年屈辱，中國要到二戰結束之後才重新立於世界，然後又遭逢國共內戰和極左運動，但無論如何，「在所有強權或潛在強權裡，中國是最勢不可當的。」(Kissinger, 1994: 829) 季辛吉對中國所形成的看法，同時來自於他的淵博知識和實務經驗，而就筆者管見，在他逐步深入理解中國外交思維的過程中，文化考量的比重與日俱增，具體例證是出版於 2011 年的《論中國》(*On China*)，該書對於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singularity) 反覆致意，<sup>8</sup> 季辛吉也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宣稱：「想要了解中國在 20 世紀的外交政策或其於 21 世紀所扮演的世界角色，都必須從掌握其傳統脈絡開始，即使這樣可能犯了過分簡化的毛病。」(Kissinger, 2011: 3) 至於季氏所見到的獨特中國傳統，他在 2014 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 中又做了一番扼要的陳述。簡單來說，那就是眾所周知的天朝心態及其衍生的朝貢體系：皇帝領有「天下」(All Under Heaven)，而「中國」(the Middle Kingdom) 是其中最精華、文明的部分，足以作為世界各地表率 (Kissinger, 2014: 213)。當然，這種描述不免流於抽象，但該體系的基本精神是「萬邦來朝」的階層性關係，以心理「順服」而非經濟或軍事「征服」為主要追求目標。<sup>9</sup> 這樣的「國際關係」，隨著 19 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勢力入侵，並將中國捲入西發里亞式 (Westphalian) 的權力平衡體系之後，顯得搖搖欲墜，但季辛吉明確指出，傳統「天朝上國」的記憶並未從中國人的腦海裡消失，隨著中國實力上升，他們期望「國際秩序朝向賦予中國更多的規則制定權，甚至是修改現行制度的方向演進。」(Kissinger, 2014: 225)

8 《論中國》第一章的標題即為「中國的特殊性」(“The Singularity of China”)。

9 當然，「天下體系」無法只憑著意識形態運作，必須要有相應的歷史情境和制度安排。歷史學者對於該體系有一些規範性的描述，一個較簡約的說明可參見高明士 (2004: 1-16)；至於費正清對「中國的世界秩序」所作的概括，構成了早期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參見 John K. Fairbank (1968: 1-19)。



不過，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延續性，並不就意味著季辛吉是個「中國例外論」的擁護者。此外，雖然季辛吉早就肯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但在「中國是否將稱霸 21 世紀」這個大問題上，他從寫作《大外交》的 1990 年代起似乎就不做如是想；<sup>10</sup> 而在 2011 年 6 月所舉辦的「孟克論壇」（the Munk Debate）裡，他更是獲邀登壇辯論，反對中國將於 21 世紀稱霸之說。

2011 年的「孟克論壇」一共邀請了四位來賓，針對「中國將稱霸 21 世紀嗎？」（“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進行攻防，後來彙集成書出版。以下將對四位講者的說辭稍加摘要，以闡明這個國關議題所涉面向之廣：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加上西方無法遏止自身的衰退，中國必然會於 21 世紀稱霸。法利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則著眼於中國經濟奇蹟的陰暗面，認為效率低落、人口減少、數據造假等會將中國帶向痛苦的社會轉型期，而亞洲鄰國對於「中國崛起」也都保持高度警戒。身為場上唯一的中國辯士，李稻葵聲明中國並無稱霸意願，但「活力」（energy）、「復興」（revival）、「影響力」（influence）等三個要素，必然保證中國將會開創一個新的模式，作為全世界開發中國家的模範。亨利·季辛吉則認為，中國無疑將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但種種內部問題如體制僵固、貧富不均、人口素質低落，以及外部問題如「中國威脅論」等，均會妨礙中國於本世紀內稱霸，因此更加務實的做法是與美國攜手，打造一個適應性、包容力更強的國際架構（弗格森等著，廖彥博譯，2012: 36-62）。

很顯然，儘管如上所示，季辛吉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十分措意，但在這場辯論裡，他用以預測中國未來走向的參數，大致上還落在「現實主義」國關理論的範疇（翁明賢，2012: 195）。不過，由於季辛吉晚近的著作，從《論中國》到《世界秩序》，透露出了越來越多的價值、文化考量，故也有學者認為，季氏實已受到「建構主義」之影響。<sup>11</sup> 但無論如何，重視中國歷史

10 在《大外交》裡，季辛吉預測 21 世紀的國際體系中將至少包含六個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Kissinger, 1994: 23）。這並不是一個中國獨霸的畫面。

11 奈伊和威爾許（2019: 15）以季辛吉為現實主義的代表者。然而，Marc Lynch（2014）在一篇評論中言之鑿鑿，季辛吉「關於權力平衡的概念，現已徹底地為規範、認同、文化等建構主義式的考量所形塑。」這雖非嚴謹的學術論文，但畢竟言之有據，可備參考。

文化，與呼喚民族情感、強調中國的特殊性甚至優越性，兩者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在四位講者當中，真正試圖以歷史元素來敲扣並超越現存的國際秩序者，非李稻葵莫屬，而他的論點，也與時下流行的「中國模式」或「中華文化偉大復興」之說相差無幾。茲略引述如下：

中國想做的是復興——復興尊重、地位，以及舊日中華文明的固  
有本質，舉例來說，就是盛唐氣象。……因此，目前中國要走的  
道路，或許是提供一種不同的社會管理的選項，在這種模式裡面，  
相對來說，更加著重社會的福祉和穩定，而不是像美國的社會體  
系那樣，注重個人的自由。（弗格森等著，2012: 166, 171-172）

這種意欲恢復傳統文化，並與近代西方價值分庭抗禮的論點，近年常見於海峽兩岸華人學者的著作，其中在臺灣最知名的，應屬朱雲漢（2015; 2020）的《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和《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其於新著當中，表達了對中國文化復興的無限嚮往：

中國思考新興大國全球責任與推進全球治理變革的最高指導思想  
應該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這是源於自己的文化傳承與數千  
年智慧的積累，也是孫中山先生一生倡議的最高理想；這既是中  
華文化嚮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共處、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  
也是中華民族追求全面復興並再度站立於先進文明之林的初衷。  
（朱雲漢，2020: 33）

筆者於此關心的，並非中華文明的「固有本質」或「最高境界」為何，而是國際關係場域中對於中國文化的不同評價。與李稻葵、朱雲漢的熱烈禮讚相反，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中國傳統的態度就似乎以負面居多。他一方面承認中國的崛起勢不可當，其經濟、科技發展遲早會趕超美國，但他同時也認為，傳統的習慣與文化——像是法治闕如、思想保守、語言文字太過複

雜等——卻會阻礙中國成爲一個真正開放性的大國（艾利森等著，林添貴譯，2013: 37）。反過來看，中國在稱霸之路上的劣勢，在李光耀眼中，都是美國所具有的絕對優勢——像是創新精神、堅韌個性、吸納人才的能力等（艾利森等，2013: 48）。在這裡我們可以觀察到李光耀的矛盾態度：作爲一名威權統治者，他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個人主義、多元文化等均嚴詞批判，而對中國的許多「維穩」措施，則表達了不得不然的同情甚至嘉許之意；但美國強大的創新能力，又顯然讓李光耀十分傾心，他所打造的城市國家新加坡，正是以達致這樣的活力與開放爲目標，在這方面，中國只能瞠乎其後。在《李光耀觀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一書裡，他更具體地表達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看法：「中國人具有悠久的歷史，這決定了政府和人民的思維方式。」（李光耀著，周殊欽等譯，2014: 30）但是這份歷史遺產當中，除了「強大的中央政權」或許還稱得上正面之外，<sup>12</sup> 其他如貪汙腐敗、缺少法治、不遵守協議、人高於制度等方面，都使得中國無法「進入不斷穩定發展的理想狀態。」（李光耀，2014: 27-28）

或許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對於新加坡而言，中國獨霸並不是一個令人樂見的前景，因此李光耀心目中的未來國際秩序，仍是以美國爲主軸而運作，而美國所展現出來的開放精神和創新能力，也才足以確保國際上的優勢地位。既然中國的稱霸之路必定受阻，李光耀建議，中國應當切實改革，方法則是「增加其與世界的貿易及投資連結。然後，中國的繁榮將愈來愈依賴其經濟制度與主要貿易國家經濟制度的相容一致。廣泛的接觸，將影響及修正其文化價值和道德標準。」（艾利森等，2013: 76）換言之，在李光耀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某些本質性、結構性的缺陷，這讓中國無法真正地主宰世界，而他所提出的建言是，中國應當與各國共同打造一個更多元、更開放、更重視相互協調的國際體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中國固有的缺陷或有機會獲得改善，而其與國際社會的關係，也將變得越來越緊密和諧。毋庸贅言，這種捨棄中國制度以就西方的作法，與中共官方當前提倡的「制度自信」背道而馳。

---

12 「中國：一個強大的中央」即《李光耀觀天下》第一章的標題。

若將李稻葵和李光耀的觀點，分別視為中國文化的「優越論」和「缺陷說」，那麼從文明角度切入國際關係，至少還有一種理論值得特別注意，即杭亭頓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說，其大意如下：冷戰結束之後，區劃國際間不同陣營的要素，將不再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是所謂的文化或文明認同(Huntington, 2003: 19-20)。該理論的要點不在於評價文明之間的優劣高低，而是著重指出，許多衍生自傳統的價值觀、世界觀並不相容，極易成為未來國際衝突的導火線。此說自1993年問世以來即引發廣大迴響(先是期刊文章，後來擴充成書)，尤其是以亞洲文明(特別是中國儒家思想)和伊斯蘭文明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挑戰者(Huntington, 2003: 102)，更是引起不少爭議。不過，即使杭亭頓的觀點飽受質疑，平心而論，他讓「文明」概念躍上政治科學的舞臺，實有典範開創，至少是別開生面之功。<sup>13</sup>

更有甚者，杭亭頓「文明衝突」說的橫空出世，提醒我們在從事國際政治分析之時，應當正視不同文明體現了不同價值觀的事實。順著這個思路，筆者想要更進一步指出，既然「文明衝突」實已蘊含了多元文化論，那麼在研究方法上，似乎就不該將其放在既成的、以西方經驗為基礎的理論架構內檢證，藉以預言未來的衝突。以中國為例，如果學者們採取上述的「文化途徑」，真心相信「王道政治」、「天下主義」對於現行模式的替代性，那麼在這一套話語系統裡面，決定國際關係理論的種種變數，如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等，被賦予的價值將大不相同——其重要程度不見得會降低，但決策關鍵性至少在名義上會有所改變——而「衝突」之性質，恐怕也與杭亭頓依其學術背景所設想者有所出入。總而言之，筆者以為，如果將文明擡升為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變因，就邏輯上來看，文化和思想的多元性、複雜性便會成為一個知識前提，如此一來，國關理論也必須將各種不同傳統的歷史獨特性納入考量，以求取更廣泛的解釋和預測能力。

---

13 例如，史學家余英時(2010: 283)便稱許道：「無論是否同意他[按：即杭亭頓]的見解，我們必須承認，他轉移了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注視焦點，即在未來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分歧，比國家、民族、意識形態等是更為根本的問題。……他重視各大宗教的功能也是因為他把『文化』看得比政治、經濟、科技等力量更為重要。」

接續本小節開頭援引吳玉山的言論，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說道：「在這些（筆者按：對於中國歷史上對外關係的）討論當中，有兩條解釋的路徑逐漸浮現出來：現實主義的解釋觀，和文化義理的解釋觀。前者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而後者是中國式理論的重點。」（吳玉山，2018: 10）約而言之，以參與「孟克論壇」的四位辯士為例，弗格森、季辛吉、扎卡利亞等三位，儘管對於「中國是否將稱霸 21 世紀」的估計不同，但他們的判斷根據，都還不脫現實主義式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與之相對，李稻葵則認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價值獨樹一格，能為未來的國際關係樹立新的典範。然而，筆者想再次強調，如果文化牽動了未來國際情勢，而其又涉及最敏感的「認同」問題（如同杭亭頓的理論所言），則對於「文化」本身進行思考，那就不僅必要，還十分迫切。但是，正如下一節將指出，從人文觀點來考辨中國的內涵，許多既定的觀念如「國家」、「民族」乃至「領土」等都可能發生動搖，那麼，如何促成這種人文知識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而發展出來的國關理論對話，似乎也是個不小的挑戰。

## 參、關於「何謂中國」的人文反思

承第二節所述，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所展開的國際關係論述，近年來蔚為風潮。這些理論強調，中國的對外關係有著歷史情境、文化內涵的特殊性，無法以現行的西方理論加以解釋；除了特殊性之外，他們更暗示或明示了中國道路的優越性，認為若接受傳統中國價值觀的引導，則國際秩序將會別開生面，不同於近代以來因普及西方模式而產生的亂局。然而，從學術觀點來看，既然「中國式國際關係理論」所重視的是有別於當前知識體系的文化和價值觀，若真正站在批判性的立場檢視，則其須連帶地引起至少兩重反思。

第一重反思是，中國文化誠然特殊，但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不特殊？這個問題或許較易回答，即儘管各個文化皆有特色，但中國以其量體龐大、歷史悠久、內涵複雜，在世界史上獨樹一格，其延伸至今，和現行的國際秩序也不完全相容。前曾述及，季辛吉雖非中國優越論者，但他融合了文化考量的國關理論實接近於此：「中國擁有全世界最長的獨立制定對

外政策的歷史，以及將對外政策建築於國家利益上的傳統。」(Kissinger, 1994: 830) 另外，從上一節的分析可知，儘管李光耀對中國的文化傳統頗有微詞，但他相信，為歷史長流所淘洗出的世界觀和行為模式，仍有力地影響著當今中國的政府和人民。

第二重反思則深入了當代人文學論辯的核心，即「何謂中國」這個大問題。為什麼需要討論「何謂中國」？這其實是第一重反思的延伸。因為既然中國的幅員廣闊如斯，歷史悠久如斯（且經過多次的統一和分裂），民族與文化內涵又繁複如斯，這都在在顯示了，能否順理成章地以「中國」來指稱這樣一個龐雜多元的文明體，並且推導出一個穩固清晰的、以中華文化為指導的國際關係理論，令人不無疑問。為了凸顯本文宗旨，以下的討論將扣緊近來關於中國的「民族」、「國家」、「文化」等議題所進行的反省，目的不在於解答「何謂中國」，而是呈現出圍繞著「何謂中國」所展開的辯論，包含了多麼複雜的問題意識。

現在學術界的一般認知是，無論就政治、族群、文化、歷史來說，中國均非一個想當然耳的實體，而是必須經由意識形態建構，才能變成「中國人」所認同、效忠的對象。劉曉原對於這一點有清晰的表述：

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對涉及領土、民族的問題，動輒以「自古以來」立論，似乎近代以來中國所經歷的大變局從未發生過。……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中國歷代王朝國家的疆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經常變更的。……如果非要強調中國疆域的久遠歷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來」的地域，對於從華夏族嬗變而來的漢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區而已。(劉曉原，2016: xiii-xiv)

儘管現在有許多人將中國的疆域規模視為理所當然，但其實自清末民初以來（即引文中提到的「近代以來中國所經歷的大變局」），革命志士們針對未來國家的形貌，便提出了種種設想，也就是說，今日為中國官方敘事所肯認的領土、族群等元素，絕非「天經地義」或「古已有之」，而是相當晚近的知識生產。舉例來說，激烈的排滿論者章太炎（1869-1936）便在一篇發

表於 1907 年的論說中提到：

今者，中華民國慮未能復先漢之舊疆，要以明時直省為根本（除緬甸），越南、朝鮮其恢復則不易，惟緬甸亦非可以旦夕致者。三荒服雖非故土，既不他屬，循勢導之，猶易於二郡一司。（章太炎，2014: 262）

也就是說，依據章太炎的設想，未來將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個漢族中心的政權，即便無法恢復漢朝故土，也應維持明朝的疆域，但可扣除以土司制度統治的緬甸（即一司）；越南、朝鮮（即二郡）雖是漢朝時的郡縣，然早已各自獨立，收回不易，只好暫且維持現狀；至於西藏、回部、蒙古（即三荒服）則為滿清所納之地，與漢人帝國無涉，不妨任其去留，但若因勢利導，或可令其安於中國的統治。由此可見，直到 20 世紀初期，關於「中國」的想像也還遠未定形，即便有一個看似明確的漢朝作為模板，但就政治上、民族上來說，劃界和定位的工程仍在艱難地進行著。至於革命領袖孫中山（1866-1925）的民族觀，更是經歷了戲劇性的變化：早年他以「驅逐韃虜」為號召，戮力推翻滿族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民國成立後，為求族群關係和諧，則順勢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號；之後擔憂中國無法統一，又倡導以漢化為實質內容的大中華民族之說。<sup>14</sup>

上面的討論已可大致呈現，當帝制崩潰，共和肇建，在打造現代國家的過程中，中國所面臨的不只是政治體制上的轉型困難，內部的族群認同和文化整合——連帶地也影響到政局和領土的穩定——似乎更加棘手。對於民國政府來說，民族問題總是重中之重，因為其繼承了清朝的版圖和人口，但滿清是以少數族群之姿入主中原，同時採取遊牧社會慣行的策略，以收編蒙、回、藏等部族，而在清室衰微之後，原先維繫各族群的利益紐帶已經似有若無，內亂與革命又加速其斷裂，何況深植於革命運動的漢族中心意識，更不

14 關於辛亥革命前後的民族國家思想轉變，可參見王柯（2014）《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特別是第九章〈構築「中華民族國家」——西方國民國家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實踐〉。

利於民族整合。<sup>15</sup> 這樣的憂慮，在前引章太炎的言論中已隱約可見，而孫中山對於民族問題的立場屢遷（從「驅逐韃虜」到「五族共和」再到「大中華民族」），也都是針對不同處境下國家統一問題的反應。

換句話說，民族認同和政治統一問題一直困擾著現代中國，以至於到了1989年，著名學者費孝通（1910-2005）還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之說來重新規範中國人的認同目標。依據他自己後來的歸納，其論述要旨有三：一、在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二、多元一體格局必須有一個凝聚的核心，那無疑就是漢族。三、高層次認同並不排斥低層次認同，兩者可以並存不悖（費孝通，1999: 13）。由這個實例可以看見，民族認同並不單純是血緣和文化問題，更與政治需求息息相關。由於意識到這種人為操縱性，王明珂對於族群問題提出了下述見解：

基於對族群現象的了解，我相信一個族群理論如果能回答「我們是誰」，這一定是個有問題的理論。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因此，透過對「中國人」這個族群現象及其本質的認識，希望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人們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王明珂，1997: 8）

需要說明的是，這並不是悲觀、虛無的論調，認為族群的本質無法定義和釐清。與此相反，正因為深刻地理解到族群現象之盤根錯節，故無法輕率地強分彼此，貼上固定的身分標籤。可以說，真正吸引王明珂關注的，是一個族群的「認同」和「記憶」如何經由社會互動，乃至透過教育和意識形態灌輸而形成；也因此，與其尋找客觀的指標以識別某個族群，更重要的可能

---

15 這裡的討論牽涉到一場已持續數十年的「新清史」爭論，即部分學者挑戰滿清乃是一漢化王朝的觀點。新清史論者強調清朝的滿族特徵，並認為清帝國是一個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推而廣之，他們也反對將現代中國視為清帝國的當然繼承者。很顯然，這場爭論的緣起本身，就體現了極為敏感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但若姑且不論各方詮釋，則清帝國統治其廣大疆域的手段，與傳統漢人王朝有別，則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汪榮祖主編（2014）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所收各篇文章，對於「新清史」提出的質疑均有重點式的回應，當然，其立場是支持清帝國漢化之說的。



是該族群在表達認同時所抱持的主觀意願。若以上文所舉的章太炎、孫中山為例，在前者眼中，只有漢人才稱得上是中國人，但對後者來說，隨著建國事業不同階段的需求，中國人的範圍也不斷地擴充。章與孫所定義的中國，或許都很難獲得非漢族人的共鳴，但無論如何，他們的例子充分展現了族群認同的主觀性與可操作性。

相對於認同議題的主觀色彩，近十年來也出現一種聲音，目的不在於回答民族學意義上的「誰是中國人」，而是追問文化、歷史意義上的「中國是什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葛兆光（2011; 2014; 2017）的一系列著作。從《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到《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葛兆光努力地想揭示中國的具體內容。他反對以近代西方式的「想像共同體」來理解中國，<sup>16</sup> 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內涵源遠流長，而自從秦漢時代奠定了中國王朝的基本規模，之後歷代的演變，都讓「中國」的概念更形豐富和強化。有趣的是，到了宋朝，由於軍事衰弱而邊患頻仍，東亞大陸上形成了列國體制，這一發展讓「嚴防夷夏」的中國意識水漲船高，由此所激發出的民族思想，在葛兆光看來，不能夠說是純粹「想像」的產物（葛兆光，2011: 49-54; 2014: 120-130；本文第四節對上述論點將有更深入的探討）。

總括而言，葛兆光（2014: 113-117）認為典型的「漢族中國文化」有如下五個方面：一、漢字的閱讀書寫和使用漢字思維；二、古代中國的家族、家國結構以及在其基礎上發展出的儒家學說；三、「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四、「天人合一」思想、陰陽五行學說；五、「天圓地方」的宇宙論所形成的天下觀。不過必須指出，葛兆光並不是一個漢族中心論者，因為他清楚地認知，經過歷史上的族群融合，尤其是元、清兩個異族王朝的統治，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具有無可否認的「文化複數性」。此外，葛兆光也是日益膨脹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烈批判者。儘管在回應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說時，他認為傳統中國對宗教的包容性，或可提供世界各大宗教彼此和睦相處的靈感

---

16 「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是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的著名論點，其認為民族國家是近代社會透過集體想像所構建出的產物。參考 Benedict Anderson (2006)。

(葛兆光, 2014: 167-170); 但面對全球新秩序的議題時, 他也清醒地指出: 「如果因為現代國際秩序來自歐洲, 就要反過來重新用『天下』和『朝貢』為代表的中國秩序替代它, 是否就一定合理呢?」由此對於「新天下主義」的宣傳者也頗多詰難 (葛兆光, 2014: 172-178, 引文見頁 174 註 37)。

許倬雲 (2009; 2014; 2015; 2017) 近年來的關懷與葛兆光有相似之處, 但他是在更大的比較文明框架內進行論述。《我者與他者: 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華夏論述: 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兩部著作採取鳥瞰式的目光, 通論中國這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歷程; 《現代文明的批判: 剖析人類未來的困境》對西方文明的流弊痛加針砭; 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則是欲闡明中國傳統的精神以「明道」「救世」。<sup>17</sup>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裡, 作者除了對傳統文化流露出鄉愁式的嚮往, 同時也不諱言道, 近代以來, 「中國文明自己也已經丟失了不少可貴的因素。本書撰寫的目的, 是在反省中國文明本身的情況, 看看是否能夠還有剩下的一些餘瀝, 足以挹注和灌溉正處於危機中的現代文明。」(許倬雲, 2017: 314) 或許可以這麼理解: 此書的撰述動機, 除了救治西方, 也未嘗不是在替中國文明把脈, 以求自我救治和療癒。

在為朱雲漢《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所寫的推薦序裡, 許倬雲 (2020: 10-11) 以宏觀視野, 對比了以「融合」為特徵的中國歷史, 以及以「鑲嵌」為特徵的西方歷史 (即在競爭中形成某種平衡的秩序), 並表達了對於中國式「天下大同」的個人偏好。在這樣簡約而概括性極強的文字當中, 筆者認為, 許氏仍然保持了史學家的分寸, 盡量以考索證據、臚列事實的精神, 對歷史進行綜合判斷。與之相比, 該書另一篇由國際關係學者鄭永年 (2020a: 18-22) 執筆的推薦序, 則是在批判西方制度的危機之餘, 直接宣稱中國現行的制度更能適應新時代的需求。這種邏輯在中國式的國際關係論述中並不罕見, 雖有宏偉的願景, 但往往缺少對於正反兩面歷史證據的細緻考察。<sup>18</sup>

17 「明道」「救世」均引自余英時 (2017: 6) 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所撰的推薦語。

18 鄭永年近年來的論著極多, 但大致上都圍繞著「中國模式」的優越性這一問題展開。舉例來說, 《大趨勢: 中國下一步》(香港: 三聯書店, 2020) 的序言便指出, 西方的政治經濟學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 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則以「發展作為國家的責任」; 更有甚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世界論壇曾經興起一股比較文明的潮流，也多人認為應當用中國文化來拯救破產的西方文化；<sup>19</sup> 但當時中西實力懸殊，故「文化救濟」之說，不過聊為精神慰藉。時至今日，面對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崛起」之勢，學者重申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甚至強調其有補於世界危機，一方面固然是國家力量上升的反映，但較為冷靜的學者，也深刻地意識到中國歷史的多元和複雜性，避免做出「一概而論」的反事實描述，也不會輕易地將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直接與「優越論」、「例外論」等畫上等號。<sup>20</sup>

近年來，中國的力量與日俱增，提倡恢復天下意識、朝貢制度者大有人在。<sup>21</sup> 不過，若從純知識的關懷出發，筆者以為應提出如下商榷：首先，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古代的朝貢體系是否適用於今日？一位學者斷言：「有些結構和規範上的重要差異存在於今昔之間，這將使得亞洲難以回歸一個儒家式的秩序。」（Acharya, 2003: 163）不管所持立場為何，這種國關理論上的探討是無法迴避的。再者，若從歷史、文化和思想來看，大多數關於朝貢體系的論述，都是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可是這個整體，實際上是一個內部極為分歧的多民族帝國，況且朝貢體系所蘊含的強烈意識形態成分（某種自我中心的文化想像和權力排序），即便在傳統帝國的疆域之內都無法將核心與邊緣一視同仁，由此造成不平等的格局，一旦涉及域外事務，情形

---

者，「如果人們梳理一下從漢朝到當代中國的經濟形態，就會發現，中國幾千年來『吾道一以貫之』，存在著一個比較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當中，頂層是國家資本，底層是自由民間資本，中間則是國家和民間的互動合作。時至今日，這個三層結構經濟體，還幫助中國免除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完成大規模的脫貧（鄭永年，2020b: xiv-xvii）。此一論旨，也具體而微地呈現在為朱雲漢著作所寫的推薦序裡。

19 筆者近來對此一論題有所分析。參見李宥霆（2019: 77-114）。

20 值得一提的是，思想史家林毓生（1983: 245）早在 1977 年的一次訪談中便明確指出，現代西方文化固然危機重重，但「我的意見與『西方危機將來非由中國文化的智慧拯救不可』這種一元論（或整體觀【holistic】）式的主張甚為不同。……這種論調不但不能替別人解決問題，反而常常使自己轉移了應該集中精力解決自己文化、社會各方面危機的注意力；到頭來，不過只是自我陶醉而已。」

21 「天下」一詞，可說是 20 世紀末以來中國學術界的熱門話題。關於各種具有代表性的天下論述以及回應，梁治平（2018: 71-177）在〈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有詳細的回顧。必須說明，許多新式的「天下主義」是由人文學者所提倡，但他們關心哲學概念的演繹較多，歷史事實的檢證較少，因此與本節所闡述的學術路徑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只會更加複雜。如此一來，若要宣稱那種「天朝以德服人」、「外國誠心向化」的朝貢體系相較於現實主義、追求權力平衡的國際秩序更加優越，則非深入中國乃至東亞的獨特歷史脈絡以找尋證據不可，但如上分析，這又無可避免地將我們帶到中國文化的複數性、歧異性等問題，而不太可能得到一個穩定清晰的「上國／萬邦」模型。誠然，任何國家的自我認同問題都絕不單純，但像中國這樣，舊體制被強行拆解而置入新秩序中，如今卻又有死灰復燃的契機，其引起重視固宜，但要如何深化認識、加強理解，以促進不同體系間的協調，則需要真正意義上的跨領域對話才能辦到，而不能僅訴諸日漸膨脹卻有違史實的民族情感。

順帶一提，一旦觸及所謂的天下或朝貢體系，則歷史學界已經普遍地認識到，在古代東亞各國仿效中國文化、制度的過程中，連「中華」、「天下」等意識都在學習之列。明朝滅亡之後朝鮮以「小中華」自居，日本與越南也都曾經建立以自我為中心的小型華夷秩序，而這些國際秩序的構築和競逐，顯然比單純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複雜許多。<sup>22</sup> 由此可見，在津津樂道於國際秩序的權力轉移之前，除了情感想像和理論推演之外，還有很多關於朝貢體系的歷史知識環節必須加以釐清。

## 肆、國關與歷史論述的實例比較

如同緒論所言，寫作本文之目的在於，釐清國關學者和歷史學者眼裡的中國，各自呈現了什麼樣的姿態。由第二小節的分析得知，在政治場域裡論述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其往往具有同質性、一元化的傾向，彷彿「中國文化」本身構成一個參數，而隨著論者立場不同，這個參數在未來的國際秩序當中，將發揮正面或負面的功能。第三小節則旨在說明，若從人文學的觀點檢視，則中國文明極為多元複雜，而許多關於中國民族、疆域、文化的認知，是在近代以來才逐漸形成的，絕非「古已有之」，因此若以過度簡化的歷史知識來推導出新型的國際關係，其結果卻可能正好是「反歷史」的。在本小節

---

22 關於這方面的新近研究成果，可參考下列論文集：張崑將編（2017）。

裡，筆者擬比較國關學者王飛凌的《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以及歷史學者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何為中國》。雖然第三節已經介紹過葛兆光對於「何謂中國」的看法，此處將更深入一層，並在三個主要問題上將兩位學者加以比較：一、對於傳統中國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整體性描述；二、關於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之評價；三、如何運用歷史詮釋於不同的專業領域。筆者相信，透過這番比較，除了揭示兩者在路徑上的差異之外，也可以回應緒論末尾處所提出的目標：釐清「在國關場域運用歷史」和「從歷史角度看待國關」兩者之間，具有什麼樣的緊張關係。

王飛凌在《中華秩序》的「引言」裡開宗明義指出：

本書加入關於中國和中國崛起的探討，試圖全面分析中國力量的本質。透過重新解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本書著重描述與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且往往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世界政治秩序，奠基於用儒學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即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之上。凡秦漢政體，必然要以中華秩序作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證明和捍衛自己，去統一、規範、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中華秩序因此意味著一個世界性的秦漢政體。它植根於長期形成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地理生態，這個中華秩序下的世界帝國（*world empire*），從西元前3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葉，幾乎統治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民族，並不斷演化以趨於完善。作為一種理念和政治傳統，中華秩序決定了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些關鍵性特質。在這兩千多年裡，整個中華世界（*Chinese World*）其實也有過多次分裂，形成多國分治時期。其中最主要的斷層期是宋代（10-13世紀）。宋代的歷史經

驗和教訓豐富而重大，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探討。（王飛凌著，王飛凌、劉驥譯校，2018: 20-21）

由於這段話涵括了全書的所有要點，故筆者將其大段摘出，以作為往後分析的基礎。在本書的開頭部分，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學研究成果，欲證明中華文化的多民族起源，以及以「中國」為正式國名的晚近性格，這些都是筆者在第三節中討論過的主題。不過王飛凌（2018: 38）十分強調，基於「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而中國在本質上的文化多元性，很容易就被統治菁英階層所宣傳的大一統意識形態給遮蔽掉了。先秦時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向來都被視為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奠基時期，作者除了給予極高的讚美之外，他的國關論述也在這裡呈現了鮮明的色彩。王飛凌認為，當時東周的各個封建諸侯，基本上是處在一個類似於西發里亞式的國際體系中，由於激烈的競爭，開啓了中國歷史上最具有創造力的時代，但自從秦始皇於西元前 221 年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之後的漢王朝接續推進帝國的構造過程，由此建立起了支配往後兩千多年歷史的集權專制政體（王飛凌，2018: 55-57）。

限於篇幅，此處無法詳細介紹王飛凌對於「秦漢政體」和「中華秩序」所做的描述，但上面的引文已經點出一些最重要的特徵，即趨向於大一統的地理因素、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的統治手段、以儒家詞彙修飾的法家政治哲學等，種種的條件配合，使得「中華秩序下秦漢政體的一個顯著的力量，是它在文化與民族上的同化能力。」（王飛凌，2018: 156）不過，作者一個更醒目的推論是，出於根深蒂固的「天命」觀念，這個體系內的所有君主，都擁有統一「整個已知世界」的渴望，以至於要不是壓制或否認外在的挑戰，那就是選擇自我隔絕，而沒有與外部體系和平共存或比較競爭的想法（王飛凌，2018: 142-143）。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這個「中華秩序」下的「秦漢政體」，具有一些結構性的缺陷：

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的行政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從而帶來持續的低效、廣泛的不公正，以及無可救藥的腐敗。……中華

秩序因此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必定邁向周期性的、不可測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擺、崩潰和重啓。(王飛凌，2018: 166)

這樣的缺陷延續至今，即作者認為表面上遵奉馬列思想、實際上繼承了傳統「秦漢政體」的中共政權，一樣具有統一全世界的企圖心，但也極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被捲入這個強盛與崩潰的循環（王飛凌，2018: 295-299）。

從以上的摘要可看出，在王飛凌這位運用大量歷史研究成果以建構國關論述的學者眼中，傳統中國——更準確地說，是大一統體制形成之後的中國——其政治與文化呈現出什麼樣的總體形貌。在此，筆者將以歷史學家葛兆光的中國論述作為對照，藉此凸顯兩個領域各自的關懷。關於葛兆光所歸納出的「漢族中國文化」，第三節已有所介紹，這裡要加強說明的是他對於中國歷史整體性所做出的判斷。葛氏說道：

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終有延續性的中國，很早就被確立起來。從公元前三世紀秦代建立統一帝國，並以官方力量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到公元前二世紀漢代在思想上「獨尊儒術」，制度上「霸王道雜之」，一個政治、文化、語言上相當同一的中華帝國在這時已經形成。(葛兆光，2014: 4)

雖然秦漢以降，迄於隋唐，中國也頻繁地歷經戰亂分裂，族群雜糅，但中華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力量仍然支配著東亞世界（葛兆光，2014: 5）。

乍看之下，王、葛二氏的描述沒有太大差異，即傳統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在秦漢帝國時已基本成形，並於往後持續地修正強化。真正區別兩者的，毋寧是論述的動機。王飛凌對中國歷史的概括性描述，目的在於提煉出一個理論，解釋由帝制中國延伸至當代中國的世界觀和行為模式，並由此預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未來走向。與之相較，葛兆光的動機截然不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相反的。他之所以涉足「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導源於對現今學術主流的反思：

近代世界和亞洲歷史的變化，越來越刺激著強調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的全球史、區域史研究，近幾十年流行的後現代歷史理論，也在鼓吹對於「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的批判。由於學界對「亞洲史」、「全球史」的興趣升溫，因此反過來在國際學界催生了這樣一個取向，即對於歷史上是否真的有「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文化高度同一性的國家也產生了懷疑，有人問：為什麼「中國」可以當作一個「歷史世界」被認同和被論述？（葛兆光，2014: 3）

事實上，一反海外中國學的主流，葛兆光不但力主中國的整體性、實在性，他也對許多有「解構」中國之虞的學術觀點提出質疑。<sup>23</sup> 不過，第三節裡也特別提到，葛兆光並不是一名中國中心主義者，他一方面反對將某些時新的史學理論加諸中國，另一方面又承認中國政治、文化同一性背後所蘊含的複雜性，此即他反覆申論的：在歷史意義上，中國的疆域和邊界是經常移動的，不能簡單地說某某地方自古以來即是中國領土；在文化意義上，中國——尤其漢族所主導的中心區域——是一個相對清晰和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在政治意義上，「中國」往往不能等同於「王朝」，也不是一家一姓的「政府」（葛兆光，2011: 31-33; 2014: 31-32）。正是在中國意識的複雜性上，宋朝所象徵的歷史轉折躍入了論述核心，對此稍加分梳，更可顯示王飛凌和葛兆光的取向差異。

葛兆光（2014: 5）指出，從 10 到 14 世紀的宋朝，中國與周邊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宋朝中國已經處在一個多國的國際環境中，開始產生了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中國』意識。」這種「中國」意識來自於漢族士人被迫嚴肅地面對「他國」與「異文明」，並導致了兩個結果：第一個是物理性的勘定邊界、管制出入境、限制外國人的居處和中國人的外出範圍；第二個是心理性的排斥外來文明、宗教和習俗，由此孳生了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正

23 在《宅茲中國》與後來的《何為中國》裡，葛兆光（2011: 3-27; 2014: 13-31）均針對五種新的中國研究路徑提出反詰：一、區域研究，二、亞洲或東亞研究，三、同心圓理論，四、蒙古時代史與新清史，五、後現代歷史學。除了早期的亞洲研究由日本學者扛鼎，同心圓理論由臺灣學者提出，其他均產生於西方（主要是美國）學界。



統論」和「道統說」（葛兆光，2011: 57-59）。

但是，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當這個特別的國家初具雛型之後，政治上的國家邊界與國際環境仍在不斷變化中，由於有限的中國卻延續著傳統「至大無外」的天下觀念和「自我中心」的朝貢體系，所以在宋代以後，這個逐漸在文化上有同一性、政治上有統一性的「中國」，卻遭遇了更多的麻煩，除了蒙元與滿清兩次異族統治所造成跨越性大帝國之外，還遇到了極為特別的三重困境，這使得「中國」作為國家，一直無法解決「內」與「外」的承認與認同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構成現代中國的困境，我認為，這些困境甚至還會延續到未來。（葛兆光，2014: 6）

引文中所說的三重困境，第一重是自從宋代列國體制形成，周邊國家（包括日本、朝鮮、安南）也都出現了「自國中心主義」，不再對中國完全地「心悅誠服」；第二重困境是，隨著與西洋文化的接觸日增，中國逐漸被拖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秩序之中，到了晚清時期，傳統的天下觀更被徹底裂解；第三重困境則是大清帝國的版圖擴大所造成的內部問題（葛兆光，2014: 6-12）。以上三點均為後代的中國意識增添了複雜性，而筆者在前文都曾經觸及，為避免枝蔓，此處不贅。但總而言之，在各家競相質疑中國文化的同一性之餘，葛兆光雖不迴避其複雜內涵，卻也試圖勾勒出一個清晰的中國形象，並且告訴讀者，這樣的中國從宋朝開始，便深植於中國人的心靈，構成其自我認知的重要內容，因此不能夠任意使用「想像共同體」之類的理論加以否定。

相較於葛兆光在文化與認同方面的關懷，王飛凌對宋朝的特殊性有全然不同的解釋。對他來說，宋朝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秦漢式帝國」，<sup>24</sup> 雖然保有傳統的天下意識，卻由於武力不振，只能在東亞大陸上維持一種西發里亞式的多國平衡狀態（北宋時期的宋、遼、西夏，以及南宋時期的宋、金、西夏），這個主要由「澶淵之盟」所造就的局面，被他稱為「澶淵體系」。儘管

24 《中華秩序》第三章首節的標題即為「宋代：一個非同尋常的秦漢式帝國」。

該體系的精神有違「天朝上國」的想像，因此被後代強烈批判，甚至否定，但是在王飛凌眼中，這卻是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因為這個由條約構成的世界秩序，「給帝國帶來了低成本的、確保無虞的國際和平、貿易、比較和競爭，故宋代的中華世界變成了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陳寅恪所說的 20 世紀之前中華文明的『最高峰』。」（王飛凌，2018: 117-130，引文見頁 130）

據統計，「瀟湘國際體系下的宋帝國享受了中華歷史上為期最長的和平時光」（王飛凌，2018: 131）。在那數百年當中，中國人口增加、生活水準提升、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發達、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學術思想蓬勃、各種文藝成果豐碩。更有甚者，和宋朝鼎足而立的其他國家，也在同一時期享受到和平、繁榮和進步，這些都足以讓宋朝在中國歷史上大放異彩（王飛凌，2018: 134-137）。長此以往，「中華世界的各族人民可能離棄了秦漢式世界帝國專制政府，發展出新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啟動科學、工業革命，以及完全的市場經濟，從而徹底擺脫中華秩序下的長期停滯。」（王飛凌，2018: 131）然而很不幸地，出於追求「天下一統」的傳統欲望，宋朝君主總是選擇和新興的遊牧強權結盟（北宋時與女真人，南宋時與蒙古人），接著又為後者覆滅，自從元朝建立之後，中國便無可回頭地朝向越來越嚴密的「秦漢政體」發展（王飛凌，2018: 123-124, 138）。

經由上述的對比可以看見，同樣是進行歷史詮釋，對於葛兆光來說，宋朝象徵著「中國」意識或民族主義的明確起點，而對於王飛凌來說，宋朝的國際關係掙脫了傳統「中華秩序」的束縛，象徵著民族命運的一大轉機（雖然終歸落空）。儘管兩者之間未必真有矛盾，但筆者想要指出，葛兆光意在呈現多元因素交織辯證的張力，不斷地提醒讀者要正視中國文化的「複數性」，而王飛凌的歷史詮釋固然極具洞見，予人啟發，但明顯的「理論化」和「古為今用」之傾向，讓他在批判傳統中國僵固的意識形態同時，自己也難免陷入了某種歷史整體論或決定論，將「中華秩序」視為一種籠罩性的政治制度、思維模式，無限期地模塑中國執政者的權力欲望，由此封閉了其他可能的歷史路徑。

誠然，無論是葛兆光或王飛凌，都是有感於學術現狀——前者是解構中國的風潮，後者是盲目讚揚中國崛起的諛辭——而重新打量中國歷史，但在

筆者看來，史學研究的方法，比較接近於「爲了認識過去而探索歷史」，而國關研究則傾向於「爲了解釋現狀、預測未來而回溯歷史」，後者的目標雖然正當，但抱持這樣的目的性來觀看歷史、運用歷史，卻可能失去許多歷史學者所講究的豐富細節。誠如王飛凌所言：

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已經闡明了中國的諸多神秘之處，但是還有許多頑固難解的中國特殊性仍然阻礙著中國學的標準化和理論化。……今天，解讀中國歷史依然是正確理解中國的關鍵。然而，那保存完好、豐富而龐大的中國歷史記錄裡充滿了故意的遺漏、無意的錯訛、巧妙的扭曲和公然的偽造。因此，仔細而全面的、帶著修正的態度去解讀中國歷史，是打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黑匣子的前提。(王飛凌，2018: 30)

的確，中國的修史傳統當中，包含了太多掌權者的意志以及特定的道德色彩，此事人所共知，不必曲爲之諱。然而，若是過度追求「標準化」和「理論化」而「帶著修正的態度去解讀中國歷史」，那麼會不會造成更多作者所反對的「扭曲」呢？當然，筆者無意判斷優劣，實際上也並無優劣可言，在各種中國論述充斥於道的當下，葛兆光和王飛凌均致力於增加論述的厚度，令人敬佩。只不過，既然中國歷史複雜如斯，各種詮釋也必然莫衷一是，對於鑑往知來的大目標，我們還需要持續推動跨領域的對話才行。

## 伍、結語和展望

筆者曾於緒論交代，本文將採取跨領域的視野，嘗試溝通國關和歷史兩個語境，以探究 20 世紀晚期以降圍繞著中國形象所展開的議論。雖然無法遍涉所有的重要著作，但通過一連串的引證分析，筆者揭示了「歷史」之於理解中國的重要性，但是基於不同關懷，這兩個領域的學者對歷史的詮釋和運用，彼此間又有多麼大的距離。

第二節的重點是國關語境裡對中國文化的評估，儘管各家所言不同——

有人以為中國將稱霸 21 世紀，有人則否；有人重視政治、經濟、社會因素，有人則高唱文化價值——但似乎都把「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當成是某種可以清楚界定、內涵明白無疑的東西。

第三節探討關於「何謂中國」的人文反思，雖然這個問題可能永遠不會有一個正確無誤的答案，但透過歷史、民族學者不懈的探究，成分複雜、內容特殊的中國有了一個較清晰的輪廓，而當前流行的「中國」想像之建構性，甚至是「中國崛起」口號的片面性，也都值得我們警惕。

第四節則在前文的基礎之上，重點比較國關學者王飛凌和歷史學者葛兆光的著作。這兩位學者都嘗試從整體來把握中國歷史，也對其從秦漢時代以降便已初步確立的特徵有所肯定。不過，葛兆光始終重視中國文化的複雜性，並且指出，至今困擾著中國的認同問題，便是這種複雜性的結果。王飛凌則基於理論需求，將秦漢之後的歷史都視為一套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加固過程（即便在少數例外時期如宋朝，也都未能擺脫該意識形態的干擾），因此其論述難免有同質化、單調化的傾向，正與史學研究所追求者相反。

根據筆者的初步探索，國關研究與歷史研究，不只是關懷的重點有異，連如何界定「中國」，恐怕都不容易取得共識。簡言之，在政治與國關的脈絡中，中國被視為外交行為的主體，其內部的整體性、同質性，似乎是不言而喻或無關緊要的前提；但在歷史與思想的脈絡中，中國的複雜性甚至實在性，則被學者不斷地追問剖析。有趣的是，這兩個大相逕庭的領域，因為中國崛起而越來越頻繁地被擺到同一個檯面上來考量。

在〈美國國關學界對中國之評估：以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為例〉一文中，唐欣偉（2013: 48-52）扼要地整理出中國問題在美國國關學者心目中的上升趨勢。這說明了「中國是否重要？」（Does China matter?）這個問題，幾乎已經一錘定音，很少人會再去否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了。然而，有關如何評估中國的國際地位並預測其未來行為，則產生了吳玉山所說的「普適主義」和「文化途徑」兩種立場（詳見本文第二節）。唐欣偉的文章主要是檢討多種主流國關理論的得失，至於比較明顯的文化途徑論點，可以透過卡拉罕的〈中國喉舌：中國例外論和歷史的政治〉這篇論文一窺究竟（第一節曾加以介紹）。該文宣稱：「在 2000 年代，中國的認同政治已走向全球，欲以

其傳統的理想來規範世界秩序。」作者檢閱了六部「從中國歷史看國際關係」的著作，並下了如此評語：「這些書籍回顧中國的王朝歷史，其所尋求的不只是中國的未來，而是整個世界的未來。」（Callahan, 2012: 34）總之，雖然所分析的書籍各有立場，但都對中國的歷史經驗特別留心。

研究當代中國的形象和地位，由於涉及到國際關係、世界局勢等，原則上較偏向政治學領域；若是加上時間維度，考察該形象如何流轉變化的，其實也只要有相當程度的歷史眼光即可，未必與嚴格的史學方法相關涉。不過，就筆者觀察，當代許多（或絕大多數）關於中國形象的研究，往往帶有政策以及戰略考量——換句話說，其不以純粹的呈現、描繪為目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功能性、意向性——正因此故，歷史意識和方法可能越顯重要，以對於史實辨偽存真，確認因果，至少可讓人正視文化內容的複雜性，而不是輕易做出結論。就理解中國的任務來說，歷史知識尤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中國本是個極端重視歷史的國度，而其文化又自成一格，與近代西方的思想模式、發展軌跡等差異甚大。季辛吉說：「歷史研究提供的不是能按圖索驥的指導手冊。歷史的教訓由類比而來，對於可資比較的情境推出可能的結論。」（Kissinger, 1994: 27）將此語套用在今日圍繞著中國而展開的國關研究上也相當貼切。儘管中國的傳統經驗與西方大異其趣，能夠「類比」到什麼程度，其實令人存疑，但為了避免盲人摸象，則回歸歷史知識，仍是建立溝通管道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季辛吉又於別處說到：美國例外論是傳教式的（missionary），中國例外論則是文化式的（cultural）。「文化」之為物，因其本質上的獨特、殊異、分化傾向，並不會強行普及其價值，但中國例外論卻又正是天朝思想、朝貢體系的產物，因此具有某種文化普遍主義的性格（Kissinger, 2011: xvi）。至於該如何面對這種西方人難以思議的「中國例外論」，似乎捨歷史之外別無良策。

身處今日，中國的影響處處可見，其甚至具有重塑世界秩序的潛力，故而「大國崛起」、「中國威脅」、「權力轉移」之類的言論紛紛出籠。然而，關於中國之前途、世界之未來這種極端複雜的問題，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和歷史知識，輔以社會科學各方面的嚴謹探索，或許還要加上大膽的猜想，才能作出基本合理的預測。基於前文的分析，筆者認為，若是國關學者和歷史學者

都對於中國的文化特徵、歷史走向感興趣，那麼一個可能的合作途徑是，國關學者更加留心歷史證據，對各種正反面的歷史詮釋保持開放，避免做出爲了理論簡明而犧牲史實的論斷，而歷史學者則可以多加關心當代議題，運用其蒐證、考據、推求因果的方法，爲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現象做出客觀的描述，則關於中國的來龍（甚至包括去脈）及其在世界舞臺的角色，庶幾能做出越來越平正的判斷。

平心而論，跨領域溝通之事本不易爲，本文雖然考察兩個領域，但筆者採取的方法，還是比較靠近思想史和學術史式的爬梳，憑藉著「中國形象」這條線索貫串勾稽，而不是去評估各種國關理論的假設、變數和解釋效力。此外，本文所分析的文獻，集中在中、英兩種語言，至於以紮實著稱的日本中國學，以及其他更多語種的中國論述，則未及將之納入。未來筆者將更拓展考察視野，期能在本議題上做出更多貢獻。

## 參考資料

### A. 中文部分

王 柯

- 2014 《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政大出版社。(Wang, Ke, 2014, *China, from Tianxia to the Nation State*.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王明珂

-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Wang, Ming-ke, 1997, *The Periphery of Huaxia: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Taipei: Asian Culture.)

王飛凌

- 2018 《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王飛凌、劉驥（譯校）。臺北：八旗文化。(Wang, Fei-ling, 2018,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Fei-ling Wang and Ji Liu (trans.). New Taipei: Gūsa Press.)

弗格森、季辛吉、李稻葵、扎卡利亞

- 2012 《中國將稱霸 21 世紀嗎？》，廖彥博（譯）。臺北：時報出版。(Ferguson, Niall, Henry Kissinger, David D. Li, and Fareed Zakaria, 2012, *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 The Munk Debate on China*, Yen-po Liao (trans.).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朱雲漢

- 2015 《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臺北：天下文化。(Chu, Yun-han, 2015, *An Intellectual's Thought on the 21st Century*.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 Company.)
- 2020 《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臺北：天下文化。  
(Chu, Yun-han, 2020,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Fission vs. Fusion*.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mpany.)
- 艾利森、布萊克維爾、韋恩
- 2013 《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省思》，林添貴（譯）。臺北：時報出版。  
(Allison, Graham,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li Wyne, 2013,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ien-kui Lin (trans.).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 余英時
- 2010 〈關於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觀察〉，見氏著，《中國文化史通釋》，頁 281-296。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Yu, Ying-shih, 2010, "Initial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pp. 281-296 in his *General Exposit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7 〈許倬雲《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推薦書〉，見許倬雲（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頁 3-6。臺北：聯經出版。  
(Yu, Ying-shih, 2017, "Recommendation for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 3-6 in Cho-yun Hsu,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吳玉山
- 2018 〈歷史與國關〉，見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頁 3-22。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  
(Wu, Yu-shan, 2018,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22 in Yu-Shan Wu (ed.),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pei: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李光耀
- 2014 《李光耀觀天下》，周殊欽、林琬緋、陳彩霞、顧耀明（譯）。臺北：天下文化。  
(Lee, Kuan Yew, 2014,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hu-ch'in Chou, Woan-fei Lim, Cai-xia Chen, and Yao-ming Gu (trans.).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mpany.)
- 李宥霆
- 2019 〈五四時期跨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兼與日本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6(1): 77-114。  
(Lee, Yu-ting, 2019, "China from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the May-Fourth Era: In Comparison with Japan,"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6(1): 77-114.)
- 汪暉
- 2008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Wang, Hui, 2008,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汪榮祖（主編）
- 2014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Wang, Jung-tzu (ed.), 2014, *Re-discussing the Nature of the Qing Empire: Response to New Qing History*. Taoyu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ress;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mpany.)
- 奈伊、威爾許
- 2019 《哈佛最熱門的國際關係課》，張小明（譯）。臺北：商業週刊。  
(Nye, Joseph S. and

David A. Welch, 2019,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10th Edition*, Xiaoming Zhang (trans.). Taipei: Business Weekly.)

拉赫曼

- 2017 《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洪世民（譯）。臺北：時報文化。（Rachman, Gideon, 2017, *Easternis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Asian Century*, Shih-min Hung (trans.).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林毓生

- 1983 〈一些關於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意見〉，見氏著，《思想與人物》，頁 243-258。臺北：聯經出版。（Lin, Yu-sheng, 1983, “Some View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pp. 243-258 in his *Ideas and Person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唐欣偉

- 2013 〈美國國關學界對中國之評估：以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為例〉，《政治科學論叢》58: 47-70。（Tang, Hsin-wei, 2013, “Evaluations of China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Offensive Realism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 47-70.）

翁明賢

- 2012 〈「二十一世紀」是誰的世紀？〉，見弗格森、季辛吉、李稻葵、扎卡利亞（著），廖彥博（譯），《中國將稱霸 21 世紀嗎？》，頁 192-199。臺北：時報出版。（Wong, Ming-hsien, 2012, “To Whom 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pp. 192-199 in Niall Ferguson, Henry Kissinger, David D. Li, and Fareed Zakaria, Yen-po Liao (trans.), *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 The Munk Debate on China*.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高明士

- 2004 〈天下原理的探討〉，見氏著，《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頁 1-16。臺北：臺大出版中心。（Kao, Ming-shih, 2004, “A Discu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ll under Heaven’,” pp. 1-16 in his *Politics and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張崑將（編）

- 2017 《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Chang, Kun-chiang (ed.), 2017, *Chinese Consciousness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Taipe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梁治平

- 2018 〈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思想》36: 71-177。（Liang, Zhiping, 2018, “Imagining ‘Tianxia’: Building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lexion* 36: 71-177.）

章太炎

- 2014 〈中華民國解〉，見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頁 257-26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Zhang, Taiyan, 2014, “Expos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p. 257-268 i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ed.),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First Collec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許倬雲

- 2009 《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出版。(Hsu, Cho-yun, 2009, *Who Am I? Who Are the Others?*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 2014 《現代文明的批判：剖析人類未來的困境》。臺北：天下文化。(Hsu, Cho-yun, 2014, *Criticism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Future Predicaments of Human Beings*.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mpany.)
- 2015 《華夏論述：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臺北：天下文化。(Hsu, Cho-yun, 2015, *Discourse of China: Evolution of a Complicated Community*.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mpany.)
- 2017 《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臺北：聯經出版。(Hsu, Cho-yun, 2017,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2020 〈推薦序——遍地烽火，何日河清：從鑲嵌到融合〉，見朱雲漢（著），《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頁 4-13。臺北：天下文化。(Hsu, Cho-yun, 2020, "Recommendation for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Fission vs. Fusion*," pp. 4-13 in Yun-han Chu,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Fission vs. Fusion*.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mpany.)

## 費孝通

- 1999 〈代序：民族研究——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與思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頁 1-17。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Fei, Xiaotong, 1999, "Preface: A Brief Account of My Experience and Thought of Ethnical Studies," pp. 1-17 in Xiaotong Fei (ed.),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葛兆光

- 2011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Ge, Zhaoguang, 2011, *Here in "China" I Dwell: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Discourses of China for Our Tim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4 《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Ge, Zhaoguang, 2014, *What Is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7 《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Ge, Zhaoguang, 2017,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Historical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劉曉原

- 2016 《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Liu, Xiaoyun, 2016, *Frontier China: 20th-Century Peripheral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鄭永年

- 2020a 〈推薦序——全球化下的西方與中國：讀朱雲漢《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的一點感悟〉，見朱雲漢（著），《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頁 14-26。臺北：天下文化。(Zheng, Yongnian, 2020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Fission vs. Fusion*," pp. 14-26 in Yun-han Chu,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Fission vs. Fusion*.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mpany.)
- 2020b 《大趨勢：中國下一步》。香港：三聯書店。(Zheng, Yongnian, 2020b, *Mega Trends*:

*China's Next Step*.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 B. 外文部分

Acharya, Amitav

2003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3): 149-164.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Berlin, Isaiah

2001 "The Divorc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pp. 80-110 in Henry Hardy (ed.),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llahan, William A.

2012 "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1): 33-55.

Fairbank, John K.

1968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p. 1-19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irbank, John 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1989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vised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ll, Stuart

1992 "Introduction," pp. 1-16 in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Huntington, Samuel P.

200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Iggers, Georg G.

2001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Modern History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ScienceDirect, Retrieved May 28, 2020,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0080430767026188>

Kissinger, Henry

1994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4 *World Order*.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Lynch, Marc

2014 "Kissinger the Constructivist,"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Sep. 5, 2020,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10/21/kissinger-the-constructivist/>

Sato, Masayuki

- 2001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ScienceDirect, Retrieved May 28, 2020,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0080430767026139?via%3Dihub>

Segal, Gerald

- 2004 “Does China Matter?” pp. 11-20 in Barry Buzan and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London: Routledge.

Skinner, William, Joseph R. Levenson, and Mary C. Wright

- 1964 “Symposium on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 505-538.

Szonyi, Michael

- 2018 “Introduction,” pp. 1-8 in Jennifer Rudolph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V. Y. Mudimbe, Bogumil Jewsiewicki, and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s.)

-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na Discourse from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 Dialogue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y**

Yu-Ting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With the sharp rise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a discourse has also become a popular genre in academia.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can be observed in those works, but there are two points that have been drawing much attention: one i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pacit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other i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a. Combined together, the two concerns bring about a spectrum of predic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even of the whole world. Despite the abundance of relative discourse, many works of the genre lay emphasis on either the contemporary or the traditional aspect of China,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is still to be enhanced.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two styles of China discourse from the late 20th century, reveal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goals and methods, and trying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ir further dialogue.

Key Words: China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